

安徒生曾经向往中国

在遥远的北欧,有一个美丽的王国,叫做丹麦。这里四周环海,物产富饶。1000多年前,令人闻风丧胆的北欧海盗在此安营扎寨,并乘着巨大的船只来往于各国,靠着征服和贸易得以生存和发展。丹麦逐渐成为全世界最古老的王国之一。1805年,汉斯·克里斯汀·安徒生就诞生在这座王国中最古老的城市——欧登塞。

当安徒生还是孩子的时候,一名年长的洗衣女工就告诉他,沿着欧登塞河河流一直往前,就能找到“中国”。于是,他就幻想着有一天,中国的皇帝会从地球的另一端挖出一条长长的隧道来到丹麦,邀请他去中国作客。安徒生梦想着,他会在中国成为一名令世人敬仰,并且非常有钱的贵族。之后,他会回到故乡欧登塞定居,在那里建造一个城堡。如今,他已梦想成真!

虽然安徒生从未到过中国,但是到访中国是他最初的梦想之一。如今,矗立在上海安徒生童话乐园里的安徒生博物馆,是由上海安徒生童话乐园与丹麦欧登塞安徒生博物馆联合打造的优秀项目,充分体现了中丹两国之间的友谊,以及安徒生童话的魅力。

“我的一生本身就是一个可爱的童话,充满着快乐及意外”,安徒生曾经用这句话开始了他的回忆。他的一生确实是一个美妙的童话。他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家庭,却变成了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安徒生的童话包含了人生中的喜怒哀乐,同时激励着人们去追求“真实、爱及自由”。对于安徒生来说,他的生命与艺术紧密结合在一起。“就像一个终点已知的旅程,我们站在船舱边,选择各自的路。”“上帝他统治着风与海,他会指使我们的人生;否则,也许接下去发生的,就是对我最好的结局,我的人生就是我工作最好的写照。”

当安徒生24岁完成个人学业后,他决定成为一名全职的作家,在接下去的几年中,他陆续出版了几本书。1835年,他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和童话故事。

安徒生的童话故事被翻译并迅速的传播到欧洲,他马上成为欧洲大陆最有名的作家之一。1867年,安徒生62岁的时候,他被授予“欧登塞荣誉市民”的称号,庆典在市政厅举办。当

安徒生“落户”上海(上)

◆ 叶永平

2017年是“中国丹麦旅游年”。百年来,来自丹麦的安徒生童话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儿童。在上海,迎来了安徒生童话乐园的开园,这是世界上第一座以安徒生童话为主题的乐园,也是中丹友谊的象征与传承……

作家在窗口接受人民举着火把游行并向他致敬的时候,整个庆典达到了高潮。曾经那名占卜师在安徒生小时候的预言变成了现实。这一天也许是安徒生一生中快乐的一天。

安徒生于1875年8月4日在哥本哈根去世。他的去世并不意味着生命的结束,就像“小美人鱼”的故事,“地球上的生活是一个梦”,安徒生说,“一个美丽的梦。”但是安徒生依然希望作为永不被世人遗忘的作家拥有永恒的生命。安徒生相信“灵魂是永恒的,死亡是通向永恒,真实生命的入口”。他认为,真实的家庭是他的读者。“我属于这个世界”,安徒生曾说过。今天,安徒生是作品被翻译最多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在全球广为流传。从这一点来说,安徒生通过他美妙的童话,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安徒生童话所倡导的古典主义道德伦理,潜移默化深植千千万万读者的心灵中,将爱与美的种子播撒广阔人间。他告诉人们要像“小美人鱼”一样对爱情无私奉献,要像“丑小鸭”一样不惧生活中的贫困与挫折……

安徒生童话在中国

一位丹麦驻华大使这样评价道:“中国对安徒生的推崇程度在世界上独一无二。事实上,安徒生童话早已被列入中国中小学教材作为学习内容,从而被各年龄段的人们所熟知,单从这方面来讲,已经很了不起了。这为我们提供了两国展开对话,加强文化交流,和加深理解的基础。”

史料可见,安徒生童话在中国的百年传

播成绩斐然,安徒生童话伴随着其他各式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第一个将安徒生介绍到中国来的是中国现代作家周作人。1913年周作人在《教育旬刊》上发表《童话略论》,文中提及:“今欧土人为童话唯丹麦安徒尔然为最工。”最初翻译安徒生作品的仍然是周作人。周作人在用文言撰写的《丹麦诗人安徒尔然传》里,将其中“第十四夜”全文译了出来。

1919年周作人用白话文直译的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女儿》——这是中国人用白话文翻译的第一篇安徒生童话,刊登于《新青年》第6卷第1期。

1925年安徒生诞辰120周年。闻名海内外的《小说月报》史无前例地特辟两期“安徒生”号。

安徒生童话全集全译本的诞生,更使安徒生童话在中国有了广泛的基础。自周作人开启的对安徒生童话的翻译和介绍,安徒生童话也从对单篇的翻译进展到合集最终是全集的隆重推出。

1950年代以后,我国相继出版了叶君健、林桦、任溶溶、石琴娥翻译的安徒生童话全集全译本。其中,任溶溶的本子译自英文,其余均译自丹麦文。安徒生童话全集全译本这一辉煌成果的诞生,是安徒生童话得以在中国整体呈现的一个划时代的重要标志。

上世纪50年代后,安徒生童话被编入学校教学课本。《海的女儿》《卖火柴的小女孩》《皇帝的新装》《丑小鸭》《豌豆公主》《拇指姑娘》《夜莺》《小意达的花儿》《坚定的锡兵》《打火匣》《野天鹅》等名篇,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童话故事,陪伴了几代人成长。

他们的上海前夜

王唯铭



6. 巴夏礼提出会审公廨

开埠以后,西方诸列强在上海租界便获得领事裁判权这种特权,内涵是:诸列强可以在租界内设立自己的领事法庭,可以对它自己国家的公民所犯的罪行进行审理,而所在国,也就是大清国官员却无权干涉。是的,这是一种不平等的法权,它不仅挑战了满清帝国的主权,也是19世纪大殖民时代所滋生的万千罪恶之一,我们不能容忍。

巴夏礼意识到治外法权必须作一个修正,这就如同之前西方人热衷于修正与满清帝国所签订的条约。原因是1853年的小刀会起义,以及在1860年、1862年李秀成兵马对上海的三次逼近,让江南地区乃至整个长江流域广大地域的有产阶级,谈虎色变地逃向上海,逃向有英国、法国军队驻扎的租界,最高峰,专家们认定涌入租界的难民达到300万人,尽管,这说法还须得到进一步考证。

剧增的人口,将当初巴歇尔与宫慕久设定的华洋分居格局给彻底打破,华洋不仅杂居,而且简直无法区分,一些西方大班对这样的情形是欢欣鼓舞着,譬如,那个叫史密斯的先生不正是靠着这个历史机遇而在筒屋建造、土地买卖中而一举崛起吗?但300万华人与数以千计的西方人混居租界也产生了严重问题,西方人现出恶霸,东方人造就出流氓,犯罪或准犯罪屡见不鲜、层出不穷,如何审理、裁决这些犯罪或准犯罪的华人,成为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针对这种情况,巴夏礼将自己的观点表达在写给他妻子的信中:

“对租借地的管理需要改进,这是我目前的主要工作。明天我要召开一次公共会议,将牵涉这一问题的所有复杂情况都逐一讨论。许多人都错误地认为我们可以把租借地视作外国人的领土,并且可以忽略中国司法裁判权对涌入外国人租借地的成百上千的中国人的控制力。”

巴夏礼的观点与额尔金的兄弟,英帝国驻北京公使卜鲁斯亦是不谋而合,这就如同

麦华陀与卜鲁斯不谋而合一样。

“我想我们的方针必须以两个原则为基础:尊重中国当局,努力使他们按照条约履行义务。因此我们应当坚持要求他们惩罚罪犯。在不与上述原则相矛盾的情况下,我们不应该同当局达成任何协定,因为他们既没有资格将他们的国民置于我们的裁判之下,也没有能力将外国人移交给我们的法庭。”

1864年4月16日,在土地租赁人的会议上,巴夏礼提出了他的方案,来解决租界内的中国人的问题:让中国官员来实行他们的裁判权,而对于租界内未设立领事馆的国家的外国人,则建立一个专门的法庭来审判。

就这样,公共租界内产生了一个特殊的司法机关,它叫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审判华人罪犯时,公堂上坐着两人,其一,苏松太兵备道道台大人委派的官员;其二,英帝国上海领事委派的下属,由中西两人领衔审理租界内的犯罪华人。一段日子后,工作方法再作调整,根据苏松太兵备道与英美领事协商后订立的《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经北京总理衙门与列强北京公使团的核准,上海的公共租界内便有了会审公廨,时间在1869年。

在西方人的视角,会审公廨的成立,完全可以将其看做是对大清国法权的尊重,也是对生活在租界内千千万万名华人在法理意义上的尊重,还不止是尊重,它是保护,“对生活在租界内的清国人施用混合司法管辖权,它的本质,不仅明智地认可对清国人的诉讼权,而且是对清国人作着另外一种意义的保护”。

卜鲁斯同意这样的观点吗?相信是:麦华陀呢,相信同样也是;而巴夏礼还用得着说吗?你可以说他是在推卸责任,你也可以说是在显示自己的公平。一部奇诡的上海史记记住了巴夏礼和麦华陀,记住了他们两人留在上海的许多事迹,以及无形但有益的精神。因了他俩的推动,上海才日趋成形,“上海先生们”才会纪念他们。我已经说过,今日泰兴路,当年叫做麦特赫斯特路;今日泰兴大楼,当年叫做麦特赫斯特公寓,都是为了纪念麦华陀。巴夏礼呢?1890年四月,上海美好的春季节,在外滩,一尊铜像高高耸起,那便是巴夏礼铜像,上海最具势力的西方人,因了巴夏礼在上海创立了会审公廨,他们给他做了一尊铜像,他们还叫他为“上海之父”。

7. 星光照耀下的小草

爱的情感像洪水一样滔滔而来。有时女孩子们会缩在各自的被窝里谈论爱情,以及什么是世界上最浪漫的爱。蒯佩瑶记得自己说过一句最傻也最诗意的话:就是长江和嘉陵江在朝天门外拥抱在一起。

17岁的少女把自己比为嘉陵江,把恋人比为长江,这大约是蒯佩瑶最为诗意的一段人生。可是,骄傲的公主没有料到嘉陵江的洪水也有被挡回去的时候。周五的下午,蒯佩瑶刻意打扮了一番来到球场。那天刘海所在的高三(7)班和高二(3)班有一场足球赛。蒯佩瑶的目光一直追随着球场上那个矫健的身影。中场休息时,人家在布置战术,她却挤进男生堆里,把一块绣花手绢递到刘海面前,这个大胆的举措引起周围男生们一阵“哦哟、哦哟”的怪叫,满头是汗的刘海看了蒯佩瑶一眼。但刘海挥手把浸润着少女体香的绣花手绢挡回去了,撩起球衣在脸上胡乱抹了一把,对他的队员们说:“我们走。”

蒯佩瑶的泪花一直含在眼眶里,除了来自父母方面的呵斥、打压,蒯小姐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大的挫折。

天黑了,起雾了,爬上一道坡,转过一道弯,一切就像梦中才会出现的场景,蒯佩瑶迷离朦胧的泪眼忽然看见路坎上坐着一个温暖的身影。温暖,是的,即便时间流淌到一个人生命的尽头,蒯佩瑶仍然会告诉你,她当年在冷湿的浓雾中感受到了那个身影带来的瞬间转变——从凄风苦雨的冬天转眼就到了暖风和煦的春天。

“你……哪个了?”“脚扭了。”“让我看看好吗?”她蹲了下去,心飞速的跳动,仿佛不蹲下,一颗青春的心就要蹦出来了。“别。”刘海缩回了那看起来伤得很重的脚,“男怕摸头、女怕摸脚,哦,不对不对,男怕摸脚,女怕……”

“都高三了,还那什么封建。你怕啥子?”蒯佩瑶仰起了头,两人的目光再度对视,即便隔着浓密阴冷的雾,爱的目光已经把天地照亮,将浓雾驱散。那个晚上便转瞬星光灿烂,清风温柔。校园里的小道幽深寂静、曲折蜿蜒,两人走到熄灯号吹响,都没有走完。爱情改变世界,爱情也塑造一个新人。

这,就是安徒生童话在中国的百年传播的真实写照。正因为,安徒生“来到”了中国,这也给中国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精神食粮”,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儿童。

在上海安徒生博物馆内,珍贵的展品,充分证明:中国现代童话在20世纪初的“五四”呐喊声中呱呱坠地,其中安徒生童话的烛照及其进射的热力的巨大影响,功不可没。

以安徒生的童话为主导,与其他西方儿童文学作品一起催生了以叶圣陶为代表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源头。

1923年出版的叶圣陶的短篇童话集《稻草人》是中国现代童话的奠基之作。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的文学童话的真正诞生。

在五卅新文化运动中涌现的一大批新文学作家,都纷纷像安徒生创作文学童话一样,为儿童创作童话。

在这一漫长进程中,茅盾、陈衡哲、赵景深、郑振铎、沈从文、老舍、丁玲、巴金、丰子恺、秦牧、宗璞等驰骋文学领域的现代作家的不断加盟,提升了中国文学童话的美学品位。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的十七年是中国童话发展的黄金时代。中国童话出现了一批佳作。当历史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这给中国的童话作家创造了良好的创作心境,更多的专以童话创作为己任的奉献力作的作家崛起,新生代童话作家横空问世。其中曹文轩于2016年4月4日荣获“国际安徒生奖”。

百年中国童话沐浴安徒生童话的不朽的光芒。在安徒生童话的光照下,中国童话作家一路播种,幻想和爱如春光进溅大地,绽放大地的花朵。

北京大学一位教授是这样评价安徒生童话的:“在中国百年来的现代史上,安徒生是个非常令人惊讶的独特人物:他绝不仅仅是一位儿童文学的写作高手,事实上,从未有另外一个外国作家像他一样,如此没有裂痕地融入汉语文化当中,并对中华民族的心灵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座在上海新落成的安徒生博物馆,仿佛就是一个中国童话的“见证人”,也是一本中国童话的“历史书”。

流亡学生刘海同学痛恨社会上的一切不公正和贫富不均,也对初恋恋人富家小姐的做派颇有微词。从那天以后,蒯佩瑶自己叠被子,抢着倒马桶。她也不再买新的洋娃娃,不再坐滑竿,和同学一起走路、挤渡船回家,因为刘海说他痛恨那些高高在上的富人。刘海同学在谈恋爱的时候没有多少甜言蜜语,更多的是对现实社会的忧愤。他不客气地说,国家大敌当前,穷人衣不蔽体,多少人抛家别子、辗转流浪、啼饥号寒,你还一个星期换一次洋娃娃,甚至还专门从香港给洋娃娃定做新衣?刘海同学的诘问,蒯佩瑶都奉为“圣旨”。人家改嘛,把洋娃娃烧了斗是(就是)。

刘海当然明白两人之间的巨大差异,这段恋情来得如此突然,让他在青春的懵懂与黑暗中,仿佛忽然被一道强光照亮,令他激动晕眩,也让他进退两难。刘海曾经忧心忡忡地说,你知道天上的一颗星和地上的一棵草的距离吗?地上的一棵草怎么能沐浴得到星星的光芒?

蒯佩瑶的答复是,你可不是一棵草,你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好多先生都说刘海是他们教书生涯中遇到的最有才华的青年。再说了,即便我是天上的一颗星,也是织女星。嘻嘻嘻嘻。蒯佩瑶觉得自己这个比喻好凄惨了,浪漫惨了。在她看来,她的爱情只有一个障碍:放下大小姐的架子就是了。什么门第之别、贫富差异,根本不是问题。她认为她讨厌自己的家庭,同情劳苦大众,与恋人一起同甘共苦共患难,刘海就没有理由不爱她。

那时的南渝中学是不允许学生谈恋爱的,一经发现,结局只有一个:开除。学校的布局也颇有意思,中间一个球场,男中部和女中部的教室和宿舍各在一边,许多学生几年书读下来,也不会认识多少异性同学。刘海在同学中有很好的人缘,他总能设计出一些需要男女生共同参加的集体活动,如合唱团排练、话剧社活动、江边野炊,远足、下乡宣传抗战等,再由一帮小兄弟帮他打掩护,学生们一远离了老师的视线,刘海就和蒯佩瑶走在一起了,在严格的校规之下,青春的暗流如春潮涌动。

重庆之眼

